

# 以声音和目光为媒： 媒介视角下公民参与的基本方式及数智化适应

赵 洁

**摘要:**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公共政策依赖于特定媒介,而任何媒介都以人的感官为基础,因而公民参与的方式可分为声音式和目光式两个基本类别:前者依凭人类声音与言说能力展开,重在意见输出和诉求表达;后者借助凝视、审视、围观等力量实现,重在监督与规训。在前大众传播时期,声音式参与是主导方式,目光式参与处于辅助地位,公民能够在诸多场合,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观点,古希腊城邦及演讲场所的规划也遵循便于声音传播的原则,言语为人们所重视,并具有强大力量。在大众传播时期,在声音式参与持续发展的同时,目光式参与较上一阶段更加凸显,公民被赋予凝视与监督的权力,开始以观众身份融入政治生活。在数智传播时期,公民声音式参与的空间与方式得到拓展,心态和行为也更加开放;目光式参与中,公民的凝视对象日趋多元,对形象的规训程度日益加深,日常审视和集体围观成为重要的参与方式。但与此同时,数智技术一方面也使虚假声音、嘈杂声音、非理性声音层出不穷,扰乱声音式参与;另一方面使得自发呈现、眼见为实难以达成,阻碍目光式参与。从媒介技术与公民参与关系的演进路径来看,媒介技术在不断拓展公民参与的“自由度”,但在参与的“有效性”方面却无法保障,因此增强信息的“保真度”成为数智化时代优化公民参与效果的关键。

**关键词:**公民参与;媒介;声音式参与;目光式参与;数智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2-005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ZZ005)

公民参与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sup>[1]10-11</sup> 放眼数智时代,媒介技术革新给公民参与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由此,如何借助数智技术推动公民参与效能提升,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自古以来,公民参与离不开特定的媒介,甚至,很多参与制度与实践的命名都与媒介直接相关。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媒介早已不只是传播的渠道或者中介,而是作为结构性要素嵌入社会生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运转与治理。公民参与作为公民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媒介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动,必然会受媒介及其逻辑的影响。政治媒介化理论认为,伴随媒介技术发展,政治组织和实践逐渐依赖媒介及媒介逻辑运转<sup>[2]47</sup>,媒介通过“延伸”“替代”“融合”和“适应”等方式在社会变革中承担关键角色<sup>[3]</sup>。基于此,以“媒介是人的延伸”,即任何媒介的使用都会作用于人的感觉比率<sup>[4]127</sup> 这一观点作为理论基点,可以从感官—媒介视角析出公民参与的最基本方式,并进一步厘清具体媒介及其逻辑何以作用于公民参与,明晰不同公民参与方式的内在要求,为优化数智时代公民参与提供参考。

纵观既有关于媒介与公民参与议题的研究,多数探讨聚焦于以下话题:一是互联网公民参与研究,重点关注社交媒体、数智技术对公民参与的促进<sup>[5-9]</sup>;二是不同媒介类别对青年、农村女性与城市居民等特定群体参与影响的考察<sup>[10-13]</sup>;三是涉及报纸、电视或互联网等具体媒介在公民参与中的应用与效能等的研究<sup>[14-16]</sup>。与之相对,从感官及其媒介延伸的角度考察公民参与的基本方式及其历史演变的研究还见之不多。因此,本研究以媒介视角切入,考察公民参与的基本方式及其内在要求,并揭示其在数智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一、媒介视角下公民参与的基本方式

由于公民参与依赖媒介,其成功地开展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公民必须能够借助一定的媒介获取所需信息,并顺利传递信息和表达意见。其次,公民参与的环境应是公开且宽容的,不仅公民在其中能够拥有观察政治发生与发展的机会,政府也需要公布各类决策与治理信息,而这也都需要借助媒介来实现。再者,公民的意见需能有效影响政治权力及其所有者的行为,这正是基于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间的多回合信息交互。从古至今,媒介在公民参与活动中都不曾缺席,话语、文字、贝壳、报纸、电视、互联网等都是公民参与所运用的媒介。基于媒介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伴随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公民参与的传播介质和逻辑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进而影响参与的方式、广度与深度。媒介及其相应的沟通规则已然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关键性结构要素。

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实质上是人的延伸,任何人类发明的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都改变着人的感觉比率。<sup>[4]127</sup>究其根本,人的感官才是人与世界沟通的最基本的媒介,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践行劳动的天然界限。其他任何媒介均以人的感官为基础,依凭人的感官而存在,并通过拓展或缩小感官的作用范围影响人的感知模式,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发挥自身的功能。由此可以推出,需要凭借媒介开展,同时又深受媒介影响的公民参与在根本上依赖于人的感官。基于此,从感官角度可以对公民参与方式展开最基本的分类,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不同媒介对公民参与方式的影响,进而探寻公民参与方式的内在要求及优化路径。总体上,基于感官及媒介延伸视角,公民参与方式可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声音式参与。其借助人体的声音(vocal)与言说能力展开,强调意见的主动表达,属于积极型方式,且大部分人都在用声音的模式思考人民权力<sup>[17]132</sup>。在古今中外的公民参与实践中,选举与投票、协商与抗议、投诉与建议等“主动发声”行为都属于声音式参与。它们依赖于人类声音及其延伸媒介,重在通过言论与投票等方式主动表达意见。人们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进入公共领域表达意见或输出观点,同时又通过各类声音来确认个人意志或众意。后续无论媒介技术如何更新换代,凡是需要借助声音展开,有关意见输出和诉求表达,旨在积极影响政府政策和立法规定的公民参与都属于声音式参与。

第二类是目光式参与。其借助人体的目光所产生的凝视、审视、围观等力量及其监督功能来实现,属于消极型方式。目光式参与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参与方式,公民通过带有权力性质的凝视与围观,能够实现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规训,从而影响政治决策,并且,与声音式参与相比,其更加便捷,也更易促成公民以集体,而非以利益分化的小群体的形态凝聚。<sup>[17]7-16</sup>时至今日,伴随着技术与媒介的发展,目光式参与越发凸显。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公民能够更加便捷地凝视官员或围观公共事件,进而影响官员和政府的作为,甚至作用于政治决策。

简言之,声音式公民参与重点关注人类的“声音”与表达能力,强调“声音”及其延伸媒介作为参与中介,作用领域是公共生活的法令和规范,即公民可以通过主动发声,影响公共决策的方式实现政治参与。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发声不仅指的是感官意义上的声音,更隐喻“意见的表达”。目光式公民参与旨在强调人类的“目光”及其观看能力,强调“目光”及其延伸媒介作为参与中介,作用于领导人形象与政府作为,即公民以观众的身份,通过凝视、审视与围观,进行监督的方式实现政治参

与。<sup>[17]6-7</sup> 两种参与方式的区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声音式参与和目光式参与的区别

公民参与方式	区分维度			
	中介	依凭能力	作用领域	具体表现
声音式	声音及其延伸	声音及其表达能力	公共生活的法令和规范	表达意见与影响决策
目光式	目光及其延伸	视觉及其观看能力	领导人形象与政府作为	展开监督与制造压力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新信息技术和媒介的产生会在人类事务中引进新的尺度,<sup>[4]33</sup>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的升级换代,新的媒介以人的声音和目光为基础,不断扩张、延伸和增强人们声音传播和目光所及的范围与程度,从而影响公民参与的方式与状态。基于这一媒介视角,本研究依据声音式与目光式公民参与方式的变化,梳理不同媒介时期的公民参与具体形式,从而厘清媒介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 二、以声音式参与为主的前大众传播时期

在古代西方社会中,公民参与实践特点鲜明,但媒介技术尚不发达,人际传播是主要的传播方式。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例,公民参与主要凭借“示现媒介系统”展开,即公民凭藉口语,也包括表情、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等人体的感官或器官本身来执行参与指令。声音式参与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参与方式,目光式参与处于辅助地位。

第一,在声音式公民参与的方式和机会上,古希腊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等设置了诸多方式和场域供公民进行表达。公民可以走上演讲台发表观点,向更多的公民传达自己的声音,或者参加诉讼与他人展开辩论,借此为政治决策或公共事务贡献智慧。比如,雅典城邦每年都会召开 40 次公民大会,以确保公民有充分的时间表达意见和公开辩论。议事会和公民法院等的正常运转也都离不开演说、倾听与辩论。<sup>[18]14-19</sup> 亚里士多德曾根据听众类型将演说分为三类:一是政治演说,即公民在公民大会上展开的,对政治问题加以审议,提出劝告的演说,听众为公民;二是诉讼演说,多指法庭上的控诉与答辩,听众为陪审员;第三类是典礼演说,用于称赞或者谴责,多数用于书面发言,听众为一般人或阅读者。<sup>[19]30</sup>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既有致力于选举投票和正式立法的公民大会,也有专供听取信息与讨论的非正式公民集会。<sup>[20]67</sup> 并且,公民大会还包含森都里亚大会、特里布斯大会等多种形式。<sup>[20]77-78</sup>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也多次提及广场、法庭、演讲台和元老院会堂这四种便于演说与辩论的场合。<sup>[21]23</sup>

第二,在声音式公民参与角色的承担和转换上,公民除作为积极的演讲者外,还会作为听众进行反馈。在公民大会等集会中,演讲者—听众的身份可以即刻转换,当公民进行意见表达后,另一些作为听众的公民能够立刻转换身份走上前台,进行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对话。退一步言之,即使部分公民在某次演讲或辩论中并未上台演讲,只是扮演听众的角色,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拥有走上讲台,发表演讲的权利和机会,而且他们还能在现场对台上发言的公民做出欢呼与喝止的反馈。这种沉默、掌声与喝止对于演讲者来说至为关键,也可以看作是态度表达的一种方式,因而同样是声音式参与的重要体现。<sup>[22]119-120</sup> 亚里士多德曾强调听众反馈与情感之于演讲者的重要性。<sup>[19]25</sup> 演讲者为了获取听众认同,需要了解听众心理,以便激发和控制他们的情感。这也是演讲术与修辞术在古希腊颇受重视与追捧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空间规划上,古希腊城邦及其各类演讲空间的规划与设置都遵循便于声音式参与开展的原则——“开放的、易于沟通的和便于声音传达的”<sup>[23]2</sup>。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理想人口规模应

以确保优良政体的实现为限,要便于执政者发号施令、政令畅通,并使公民之间相互熟识、知悉彼此品性。<sup>[24]354-356</sup>哈耶克将亚里士多德的观察总结为“人类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sup>[25]7</sup>,足见声音式参与之重要。古罗马的疆域大幅扩张,但不同类别和层级的议事会也由此产生,这也保证了声音式参与的有效实现。

此外,古希腊公民的演讲和辩论场所亦是非常丰富且有讲究的。理查德·桑内特指出雅典将公民置于市集与剧场两种空间中,每种空间都赋予民众不同的说话体验。并且,雅典还建设了多种便于人们聚集与讨论的功能性建筑,如可容纳1500人的法庭、设有500人座席的议事厅,以及供50人规模的城市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圆形神庙等。<sup>[26]27-32</sup>这些建筑内部的设计都考量了声音传播的问题。如位于雅典集市西面的议事厅(Council House)有着剧院一般的斜坡式位置,便于听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声音上来,讲演者的声音也能够得到放大,而且由于它墙体较高,并且有屋顶,因此确保声音可以在其中尽情发挥。<sup>[26]32</sup>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各种演讲场所中斜坡式位置的设置也便于公民的监看。斜坡式的座位有利于呈现演讲者的表现,帮助每位参会人员大体上能看到投票或抽签的情况。此外,雅典等城邦还会利用光影等多元化的方式与巧思使公民尽可能看清演讲者。但是,由于视觉认知对于清晰度要求相对更高,尽管有这些设置辅助公民展开视觉监看,其效果依然受物理距离的限制,导致细节难以辨认。因而,这一时期虽不乏目光式参与,但是它一般是辅助,用来配合声音式参与的展开。

第四,在声音式参与的影响力上,言语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力量毋庸置疑的强大。雅典民主是以言行为基础的(speech-act-based)民主政治,公共言论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民主政治的运转建基于公民的决策提议与决定、控诉与申辩、称赞与指责等“公共言论”<sup>[27]10,20</sup>之中。无论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还是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其中都暗含着言语与声音的力量。在对苏格拉底审判之前,苏格拉底最亲近的弟子赫尔摩奇尼斯(Hermonius)求苏格拉底要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原因正是陪审员很容易被口才所折服。<sup>[28]212</sup>在古罗马的公共生活中,政治演讲和法律演讲更是必不可少,“共和国的宪法要求那些寻求更高职位的人必须练习演说术”<sup>[29]30</sup>,并且认为政治演讲等在任何和平与自由的社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sup>[21]227</sup>。

综上,在西方古代的公民生活中,公民在表达与回应的持续往返中实现了对公共生活和政治决策的参与。正如费什金(Forsyth)指出:“追溯古代雅典民主的起源,可以发现其民主制度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形式”。<sup>[30]222</sup>当然,不能否认这一时期也存在目光式参与,毕竟演说者的形象与神态也影响着演讲的效果,但其只是辅助和从属,并未独立成为一种成熟的参与机制。

### 三、双重参与方式凸显的大众传播时期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族国家疆域得到拓展,人口数量增多,公民大范围频繁的直接参与不再具备实现条件。从媒介史来看,大致在同一阶段,伴随印刷和电子技术的发展,报纸、电视等可以延伸人类感官及其功能的大众媒介逐渐发展与丰富,这些媒介适应与推动了声音式与目光式参与的开展。

#### (一)声音式公民参与的延续发展

在这一阶段,声音式公民参与仍然普遍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出现了方式的变化与创新。

第一,声音式公民参与以制度化的形式持续发展。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多数情况下公民都无法直接、有效地参与政府政策制定,更多是通过选举、投票等制度设计间接地表达自身的偏好与决定。必须肯定,现代政治中的投票、选举、政党内部沟通等方式依然是声音式参与思路下的产物,公民可以通过这些制度设计明确地表达观点和展现态度。此外,各国愈发重视公民在投票与选举之前或者过程中,就某一公共政策、事件或议题进行面对面协商与讨论,甚至很多学者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复兴直接参与理想的民主形式”<sup>[31]</sup>。这同样是声音式公民参与的一种实践形式。

第二,声音式参与的环境与方式得到优化与创新。17世纪以来,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相继出现并开始广泛发挥信息传递和社会监督等功能。大众媒介在这一时期的公民参与中主要扮演公共论坛和信息提供者两种角色。前者为民众提供意见表达、进行讨论的平台,公民分散的意见能够通过其呈现为整体的公共舆论进而实现公民参与;后者指其作为信息的供给者能够为政府及决策者提供公共信息<sup>[32]</sup><sup>3</sup>。这使公民在代议制民主中无法进行直接表达的困境得到纾缓。甚至,有学者做出这样的乐观判断:现代技术,尤其是电视,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任何特殊的本地集会的隔绝,使人民完全具备直接参与政治辩论和决策制定的可能性。<sup>[33]</sup><sup>122</sup>

根据布鲁斯·宾伯的研究,在19世纪的美国,报纸、宣传册已经成为公民与政党进行交流,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媒介。<sup>[34]</sup><sup>54</sup>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着手建立和改造了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网络,这些媒体,一方面作为喉舌代表党和国家发布各类政策信息,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作为桥梁连接起党和群众,专门设立群众来信栏目等方便群众提出各类意见和建议。这均说明报纸等大众媒介是公民有效展开声音式参与的重要媒介,公民能够通过报纸等向政党与政府表达态度与诉求。此外,报纸、宣传册等还能助力形成和传播公共舆论,这同样有助于公民展开声音式参与。研究表明,公共舆论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对政策产生影响,而在舆论确实发挥作用的情境中,超过半数会推动政策发生实质性调整与改变。<sup>[35]</sup>

第三,声音式公民参与效果的不确定性增强。就选举、投票等方式而言,这种声音式参与往往建立在有限选择的情况下,是一种间接的、模糊的、非此即彼式的表达。甚至,有些所谓的公民意见表达只是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不会被真正采纳。就协商民主而言,其在很多国家中尚未被提升至国家制度层面,其实践主要是基层治理。<sup>[36]</sup>就凭借大众传媒展开的声音式参与而言,这种参与方式并非连续的、决定性的和清晰的,在多层级的传播过程中,公民声音有被忽略、淡化和扭曲的可能。有时还需耗费大量资源才能成功传播,即那些被众多公民特别关注并积极表达的话题更容易被纳入政策考量。

总体看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大众传播情境中,声音式参与成功延续并形成三种类型:一是直接的声音式参与。这种参与多局限于小范围内,由被选举出的选民代表、部分官员或者被挑选出的公民等践行,用以实现政治决策决议和协商。二是间接的制度化的声音式参与。即公民通过投票、选举、抗议等制度化方式展开参与,这种参与是声音式参与的制度化延续,保证了声音式参与的合法性和主导性。但是,这种参与往往是间接的,且时常断裂,更多是阶段性的宏观立场选择,而非具体观点表达,是单向性的输出而缺少即时的回复与反馈。三是间接的非制度化的声音式参与,即公民借助大众媒介展开的参与。它扩大了公民声音的传播范围,提升了公民展开政治参与的可能,并且当公民分散的声音凝结成公共舆论时,声音的力量也得以增强。

## (二)目光式公民参与的进一步凸显

在声音式参与持续发展变化的同时,目光式参与亦进一步凸显。在现代政治中,公民参与的心态与程度都有所转变。一些公民虽然在心理上关心政治,但无法时刻保持参与状态,只能参与阶段性的选举与投票活动;一些逐渐不再关心政府决策、国际关系等宏观政治,转而关注性别平等、少数民族裔等微观政治,经常地参与一些小型社会团体及其活动;一些则完全沉迷于私人生活与娱乐之中,对政治视若无睹,以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因而,电视等以视觉成像为核心的媒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一时期公民参与的状态,创新了公民参与的方式,目光式参与得以凸显。

第一,凭借电视这一媒介,公民观察、审视与评价的权力大幅增强,开始以观众身份参与政治生活。随着电视在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政治领导人、政治竞选人愈发依赖电视等大众媒介建立和维持与公众和选民的关系。电视是一种以视觉呈现为基础的媒介,因而“形象”逐渐被推至政治传播前台,电视辩论、竞选广告、新闻发布和候选者形象塑造等以视觉形象呈现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活动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电视直播的状态下,候选者或领导人的形象、能力、状态和行为都实时地

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任何一种不适当的形象或行为都会影响他们的吸引力与信服力。基于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可见性就是捕捉器,<sup>[37]225-226</sup>进而可以将观看与被观看视为一种权力作用机制。就此而言,作为观众的公民事实成为一种凝视主体,候选者和领导人成为被凝视的客体,后者处于一种有意识的和可持续的可见状态,前者对后者形成了具有压迫性的关注。并且,公民对于候选者或者领导人的形象偏好亦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前者对后者形象的规训与勾勒。候选者和领导人会雇用专业的政治形象顾问和营销团队,结合自身特点与优势打造形象,调整行为等。此外,即使公民一开始只是被动地被电视中所呈现的视觉形象所吸引,但后续他们的偏好与评价也可能转化为主动参与。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电视是去政治化的,认为电视将人们禁锢在家里,而不会出门去抗议<sup>[38]</sup>。这恰恰从侧面证明了目光式参与存在的基础——正是因为人们共聚家中观看电视,声音式参与逐渐减少,目光式参与行为才得以凸显。

第二,公民能够以观众的身份更加自然地融入政治生活的经验结构,从而加强公民参与。对于十分关注政治的公民而言,他们不仅会通过电视主动寻求有关竞选、政党和国家大事的信息,而且电视中呈现的政治形象与信息也会激发其对政治的更大兴趣,如进一步解读或挖掘领导人形象等。对于关注点在娱乐或私人生活方面的公民而言,电视也能够使其有意或无意地接触领导人、候选者的形象或者其他政治信息,推动公民展开政治参与。这是因为在一些国家的电视节目中,即使是娱乐节目,也常会嵌入热门政治话题,或是邀请政治候选人、公众人物与公民沟通,甚至这种在娱乐节目中呈现政治议题的做法一度成为电视节目制作人吸引观众的流行策略。<sup>[39]6</sup>这些都使得荧幕前的公民以观众的身份自然地融入政治生活中,以目光观察审视荧屏上的公众人物,并且以形象为基础产生政治偏好与兴趣。

第三,公民作为观众更容易结成统一的共同体,共同参与公共生活。电视属于中心化媒介,其常规操作是统一播放各类节目,观众的选择是有限的,且接触到的信息相差无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庆典、竞技等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或社会仪式感的节目上,其大多依托电视进行现场直播。这意味着观众,一是多在同一时间观看同样的节目,接收同样的情感输入,由此更容易形成情感和观念的共同体;二是基于视觉呈现真实、生动、鲜活等特征,观众不仅容易被吸引,还极易迸发出强烈、鲜明的情感。此外,借助电视、电影等视觉媒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还会被放大和再创作,进而引发更加强烈的关注。例如,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差异和压迫在电视中呈现出来后,就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因而,在电视的催化下,人们更容易结成情感共同体,并开展进一步的参与行为。

至此,公民或凭借声音积极、直接地进行意见表达,或作为观众通过凝视形象间接达致对政治权力拥有者或谋求者的规训。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声音式和目光式参与并非完全独立,常常相互联动和彼此促进。比如人们对候选人形象的审视最终要通过意见表达的方式进行传播,再如一些政治类电视节目也会围绕相关人物和议题展开即兴采访等。

#### 四、双重参与方式在数智传播时期的新变化

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推动社会进入数智传播时代。在这一进程中,互联网成为传播的底层架构,数据成为核心传播资源,智能传播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传播权力也由传统媒体逐渐转向个体与平台。作为革命性技术,数智技术持续演进,并作为一种“民主技术”,广泛用于文明社会与国家中,极大地拓展了公民的交流方式。在其赋能之下,声音式与目光式参与均呈现出新形态与新变化。

##### (一)声音式公民参与的显著增强

在数智技术的加持下,时空界限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连接更加方便和广泛。因此,人数众多和距离遥远不再是直接沟通的障碍,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间能够跨越空间的阻隔。由此,上一阶段间接的、断裂的、模糊的和非此即彼式的表达具备了转变为直接的、持续的、清晰的和多元化表

达的可能,声音式公民参与迎来了新的契机。

第一,声音式公民参与的空间得到有效拓展,公民在互联网空间中能够更加便捷地表达意见。在大众传播时期,公民参与的空间多集中于现实世界,且信息传播权力主要由政府机关和新闻传播专业机构所掌握,他们是信息集散的 center 地和传播议程的设置者。因此,公民的声音是否能够顺利向政府传递及获得社会关注受制于诸多因素。而伴随互联网的成熟发展,公民声音式参与的空间扩宽至网络世界,并且可以实现线下与线上参与的呼应与联动。基于互联网空间中传播的即时性、直接性、公开性和互动性等特性,公民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接触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和新声音,还可以直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精准地向政府,公开地向社会表达自身的意见与诉求。

第二,声音式参与变得更加多元化。20世纪末,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来自选民的信息按照传播方式可分为若干等级:最重要的是私人信件;其次是当面拜访和电话;继而是传真和严肃的电子邮件等。<sup>[40]</sup>从这三个等级看,声音式参与有线上与线下的区分,且线上形式也有众多不同方式。首先,公民能够通过政府网站、总统个人网站、政府社交账号、电子邮箱等方式与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直接联系,一对一地表达自身的意见和诉求。其次,公民在社交平台或网站上可以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表达态度或形成公共舆论。正如约翰·基恩所说,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核心技术,能降低费用,使公民以从未想到的方式进行交流。<sup>[41]</sup>比如,网站或者社交平台等设置的点赞、留言、跟帖等便捷功能,当公民认可或者反对某条信息时,就可以通过上述方式迅速地表达态度。当然,个别的表达也许并不能获得重视,但基于热搜排行榜等传播机制,公民的声音不仅能够多样化传播,还能够以“集体关注”的形式呈现,从而凝聚起巨大的能量。

第三,公民声音式参与的心态和行为变得更加开放与大胆,频率和实效也有所提升。在众多网站与社交平台上,网民常以匿名身份进行言论表达与互动。这种匿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沉默螺旋效应,使公民更敢于突破社会规范与群体压力的限制,主动地参与公共对话。同时,点赞、转发、投票等便捷传播机制使得态度表达成为一种常见的参与形式,从而提升声音式参与的频率。此外,声音的传播力在距离与速度两方面均显著增强。在传播距离上,公民表达可依托网络平台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突破地理与身份的限制,实现远距离、跨圈层扩散。在传播速度上,声音可即时、广泛传播,甚至实现实时互动与定向传递。由此,声音式参与的可能性与实效性均得到进一步拓展。

## (二)目光式公民参与的日益深化

伴随数智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信息公开的可能性和透明度会随之增强,网民尤其是公共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于公共视野;主观上,人们也越发愿意在社交平台中展露自我心绪、塑造自我形象。基于此,目光式参与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不仅公众展开目光式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增强,而且目光式参与与声音式参与的协同配合更为紧密,二者相互促进,甚至彼此融合。

第一,公民凝视的对象得到拓展。在大众传播阶段,各类新闻报道、领导人讲话、总统辩论以及电影艺术形象呈现大多围绕较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展开,公民凝视的对象聚焦于特定人群。但是,与电视营造的媒介环境不同,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是一个类似“共景监狱”<sup>[42]</sup>的信息场域,形成了一种围观式结构。无论是高层候选者和领导人,还是中低层级的官员,乃至普通网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来自众人的监督和集体的压力。

第二,公民对候选者和领导人形象的规训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前一阶段,领导人和候选者多出现在电视辩论、公共危机处理、重大会议等专业性显著的场合。因此,公民对于他们形象的规训往往聚焦于其专业表现,重点关注他们在工作场合中的行为举止。发展至今,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公私交融的属性,候选者和领导人的能见度大幅提升,他们出现的场合不再只是工作场合,所承担的角色也不再只是行政职务。那些本应属于私人领域的话语、日常生活、微末作为以及家庭角色,也广泛地进入公共视野。这意味着公民对政治人物形象的规训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与深化,已经从工作领域延伸至日常生活,从专业行为拓展至私人秉性。与之相应,政治人物也不再只是展现专业形象,而

是利用各种日常场合塑造独具魅力的整体形象,打造独具一格的政治品牌。

第三,除形象凝视外,日常审视和集体围观也开始成为目光式参与的重要方式。在互联网中,政治暗箱在一定程度上被打开,信息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传播阻隔得以疏通。公民们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渠道和工具来关注、了解甚至审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从而达到监督之目的。比如,依托网络平台和数智技术,公民能够在第一时间或反复观看相关工作人员处理社会事件或发表公共言论的视频,深度搜索他们衣食住行的品牌与价位,持续跟踪他们及其家人的各种言论与行为来实现监督。况且,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也是这一时期各国的整体趋势,公众能通过门户网站、社交平台、终端查询机等直接审视与监督相关工作。基于此,舒德森笔下的“监督员公民”<sup>[43]267</sup> 会愈发成熟。此外,围观也成为目光式参与的另一种方式。与凝视与审视相区别,其有两大特征:一是主体是大众。凝视与审视以个体为主体,那么当所有个体在同一时间内对某一人物或事件予以凝视和审视时,则形成了围观。二是作为目光式参与,个体参与围观的程度不一,可能处于凝视与审视阶段,也可能只停留在看见、留意等阶段。但是,虽然个体看见的力量微不足道,众人围观却足以显示集体取向,甚至与声音式参与协同,引起舆论狂潮,获得政府部门的关注,从而成功设置政治议程。

### 五、声音式与目光式公民参与的挑战与适应

综上所述,在不同历史时期,各类公民参与制度及设计轮番登场,不同国家的公民参与实践也都有所差异。不过,选举、投票、建言献策和监督等一直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从整体来看,声音式和目光式参与在公民政治生活中共同作用。前者主要体现为主动意义上的政治表达、政治沟通与政治反馈三类形式,作为一种内部控制机制影响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事件的判断,它始终存在于公民参与的历史中,并发挥着主要作用;后者主要是通过凝视、注视、审视和围观达到规训、监督和施加压力的目的,作为一种外部控制机制作用于领导人与政府机构的形象与作为,它伴随媒介与制度的演化越发凸显。

对于这两种基本的公民参与方式而言,数智技术快速迭代必然会赋能其发展,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新挑战。

就声音式参与而言,虚假声音、嘈杂声音、非理性声音等层出不穷,阻碍了声音式公民参与的顺利展开。一是虚假声音泛滥,扰乱声音式公民参与秩序。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并产生深刻影响,政治亦不例外。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高度模拟人类思维和行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针对人类提出的问题自主展开讨论,而且已经深度渗入政治生活;社交机器人不仅能够参与社交互动和传播大量信息,并且还偏向发布或评议煽动性议题<sup>[44]</sup>。基于此,与过去相比,虚假信息不仅变得更加真实生动,很难通过溯源等方式辨其真伪;而且还变得更加普遍,网络各处都充斥着完全虚假抑或真假参半的信息。因而,当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自主生产并传播各类虚假信息时,他们在事实上也参与声音式表达,并与真实的意见和诉求表达混合,使公民态度、意见与反馈的传播变得含混不清,扰乱了政治沟通进程,拉低了声音式参与的效率。

二是各类声音嘈杂纷繁,既较难形成合力,又容易转瞬即逝,影响声音式参与的实际效果。互联网中公民表达的高度自由也意味着公民的声音往往呈现出众声喧哗、支离破碎的状态,除非是引起社会集体热议的话题,否则难以引起集中关注和巨大反响,更难以获得政府重视,顺利转化为真正的政策。此外,在数智技术的加持下,各类声音会此起彼伏,快速更迭,即使信息在客观上得到了长久保存,但依旧无法获得人们主观上的长期关注。甚至即便公民的声音获得了暂时的关注,但由于热点更新迅速,公民的表达会被此起彼伏的声音覆盖,进而影响声音式参与的实际效果,出现“烂尾”效应。

三是非理性声音大量存在,拉低声音式参与的效率。公民参与的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理性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数智时代,由于网络中声音表达与传播的便捷性、匿名性及公私交融

性,很多声音都以非理性的样态存在。这虽然在行为上能够算作公民参与,但是事实上却浪费了参与资源,拉低了参与效率。

就目光式参与而言,坦诚性这一根本条件在数智时代更难以满足,这直接影响目光式参与的效果。根据格林的观点,坦诚性是目光式参与实现的基本条件,即政治人物不应利用权力操控自身公开露面的情境与过程。<sup>[17]</sup><sup>12</sup>完全的坦诚本就具有理想性,自公民借用目光进行政治参与始,政治人物就十分注重设计自身形象,后来出现的政治“营销师”和“化妆师”的作用也正在于此。这意味着政治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操控自己的出场条件,目光式参与所要求的坦诚性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发展至数智时代,政治营销人员专业性极强,不仅深谙选民心理,营销手段亦日臻成熟,他们能够利用民意调查、舆情研判等技术手段,更加精准地定位选民群体、研判选民需求,从而针对性地塑造候选人形象、导演媒介事件等,这严重侵蚀了坦诚性原则,影响公民目光式参与的顺利展开。此外,在数智时代,“眼见为实”不复存在,“以假乱真”成为可能。数智技术的发展和算法算力的增强使得拟真再现的内容更加泛滥,AI换脸、语音模拟、视频生成等广泛存在于网络之中。通过一句话,Sora就能够生成一幅生动的图片;借助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人们在视频中的所言所行都可能被篡改而且难以被甄别。基于此,坦诚性面临的限制与挑战正在增加。

基于数智技术给公民参与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公民参与对数智化时代的适应就变得越发关键。从公民参与的历史演变来看,除参与制度外,媒介技术与形态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关键变量,其会影响声音式参与和目光式参与的“参与自由度”——跨越时空的参与能力,以及“参与有效性”——参与的可能效果。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大众传播再到当前的数智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确实一直在“自由度”上赋能公民,使其拥有更大的参与自主权和能动性。人类的聲音和目光逐步突破身体的限制,跨越时空的束缚,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实现对政治生活和政策决策的参与。不过,发展至今,媒介技术在拓宽公民参与“自由度”的同时,在信息的“保真度”方面却效果难测,从而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数智技术赋能公民参与的同时,也使公民进入了一个喧嚣嘈杂、虚实难分的“保真度”极低的世界中,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民凭借声音和目光开展有效参与。故而,时至今日,在保证既有传播“自由度”的基础上,利用数智技术和制度安排最大化地增强信息的“保真度”是增强公民参与有效性的关键。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公民的“信息视力”,夯实“监督员公民”形成的基本条件,助力实现全民、全天候、全方位的公共监督;同时持续增强公民的“表达效力”,提升“意见型公民”参与的政策转化率,推动形成理性、建设性的公共舆论。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刘君,李鑫,漆俊邑,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 [3] SCHULZ W.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1): 87-101.
- [4]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5] 夏志强,王奕杰. 计算民主:从网络意见表达到智能民意聚合的演进逻辑建构. *社会科学研究*, 2026(1): 115-127.
- [6] 张宁,唐嘉仪. 社交媒体、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微博为例的实证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2):99-111.
- [7] 朱江丽. 新媒体推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行政管理*, 2017(6):49-53.
- [8] 潘忠党. 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的普遍性. *新闻大学*, 2012(6):42-53.
- [9] JENSEN J 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line: the replacement and the mobilisation hypotheses revisited.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13, 36(4):347-364.
- [10] 张明新,常明芝. 青年群体的媒体使用对政治表达的影响——检验政治知识与媒体信任的调节效果. *新闻与传*

- 播评论,2023(1):76-86.
- [11] 李长乐,彭剑. 媒介使用偏好、使用时长对居民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 传媒观察,2021(11):63-71.
- [12] 郭夏娟,魏芃. 互联网对农村女性村庄治理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61-81.
- [13] 曾凡斌.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10):33-40.
- [14] 宋奇,宫贺. “行政吸纳公共参与”:中国基层社会情境的社区媒介研究. 传媒观察,2024(10):78-85.
- [15]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 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11):37-56.
- [16] OSER J,GRINSON A,BOULIANNE S,et al. How political efficacy relates to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22,39(5):607-633.
- [17] 格林. 人民之眼:观众时代的民主. 孙仲,陶力行,张鑫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 [18] 王绍光.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19]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 罗念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 [20] 林托特. 罗马共和国政制. 晏绍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1] 西塞罗. 论演说家. 王焕生,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 [22] MORSTEIN-MARX R. Mass orato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 [23] 赵立行. 忧思现代文明的另类视角——读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25]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 冯克利,胡晋华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6] 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7] OBER J. The Athenian Revolution: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 [28] 斯东. 苏格拉底的审判. 董乐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9] FORSYTH W. Life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vol. 1. London:Forgotten Books,2015.
- [30] FISHKIN J S. Deliberative democracy//SIMON R. The Blackwell guide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2.
- [31] 陈家刚. 数字协商民主:认知边界、行政价值与实践空间. 中国行政管理,2022(1):26-32.
- [32] VOLTMER K.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London:Routledge,2006.
- [33] 阿伯拉斯特. 民主. 孙荣飞,段保良,文雅,译. 3版.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34] 宾伯. 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 刘钢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35] BURSTEIN P.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a review and an agend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3,56(1):29-40.
- [36] 高建. 两种不同的协商民主. 山东社会科学,2014(2):22-26.
- [37] 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刘北城,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38] 常江,徐帅. 伊莱休·卡茨:新媒体加速了政治的日常化——媒介使用、政治参与和传播研究的进路. 新闻界,2018(9):4-9.
- [39] 琼斯. 娱乐政治:讽刺电视与政治参与. 林莺,译. 2版.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 [40] CARTER M. Speaking up in the Internet age:use and value of constituent e-mail and congressional web-sites. *Parliamentary Affairs*,1999,52(3):464-479.
- [41] 基恩. 民主与传播媒介. 冲礼,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3):97-115.
- [42] 喻国明. 媒体变革: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 人民论坛,2009(15):21.
- [43] 舒德森.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郑一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44] 韩娜,孙颖. 国家安全视域下社交机器人涉华议题操纵行为探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8):40-49.

## The Voice and the Gaze as Media: Evolu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ath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Adaptation from a Media Perspective

*Zhao Ji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life and influence on public policy rely on specific media, and any media is based on human senses. Therefore, the way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asic categories: voice-based and gaze-based. Voice-based participation relies on human voice and speaking ability, focusing on opinion output and demand expression; gaze-based particip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power of gazing, scrutinizing, and onlooking, focusing on supervision and discipline. During the era of pre-mass communication, voice-based participation served as the dominant way, while gaze-based participation played a supporting role. Citizens we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in various settings and through multiple means. The planning of city-states and speech venues also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facilitating voice communication. Speech was highly valued and possessed great power. During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while voice-based participation continued to evolve, gaze-based participation became more promin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tage. Citizens were empowered to observe and scrutinize, integrating into political life as spectator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the spaces and ways for citizen voice-based participation have expanded, with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becoming more open. In gaze-based participation, the objects of citizens' scrutiny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diverse, while the degree of disciplinary control over images has deepened. Daily scrutiny and collective spectatorship have emerged as significan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also led to an endless stream of false, chaotic and irrational voices, disrupting voice-based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spontaneous presentation and "seeing is believing", hindering gaze-based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technolog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dia technology continually expands the "degree of freedom"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yet fails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fidelity"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crucial for opt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dia; voice-based participation; gaze-based participation; adapt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

■ 收稿日期: 2025-07-31

■ 作者单位: 赵 洁,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8

■ 责任编辑: 肖劲草